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(92)

On and Off the Playing Fields: A Modern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for Girls in Eastern China, 1895-1937

Yu Chien-ming 游鑑明 著

運動場內外

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 (1895-1937)



東司令台

Yu Chuen-ming

On and Off the Playing Fields: A Modern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for Girls in Eastern China (1895-1937)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

運動場內外：
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
(1895-1937)

游鑑明 著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運動場內外：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(1895-1937)／游鑑明著．

--初版．--臺北市：中研院近代史所，民 98.08

面； 公分．--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；92）

參考書目：面

含索引

ISBN 978-986-01-9302-2（精裝）．--

ISBN 978-986-01-9303-9（平裝）

1. 體育 2. 女性 3. 近代史 4. 中國

528.992

98012684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(92)

運動場內外：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(1895-1937)

著 者／游鑑明

出 版 者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發 行 者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

電話：(02) 2782-4166

劃撥帳號／1034172-5

戶 名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訂 購 處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

印 刷／易風格數位快印有限公司

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39 之 4 號

電 話／(02) 2651-3888

初 版／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

定 價／精裝新臺幣 400 元 平裝新臺幣 350 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GPN 1009801844（精裝） GPN 1009801845（平裝）

導 言

2008 年 8 月，第 29 屆奧運會在北京開幕後，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都搶著報導奧運會場內或場外的各種消息，8 月 15 日這天，備受臺灣球迷看好的中華棒球隊，以一分之差輸給中國大陸隊之後，許多球迷傷心之餘，把這天訂為「國恥日」；而 2004 年獲得奧運金牌的臺灣跆拳道選手朱木炎，也因為這屆奧運僅得到銅牌，在教練張榮三陪同下，於 8 月 20 日的國際記者會中，不斷向臺灣民眾致歉，他們的第一句話都是：「對不起國家！」¹不過，負傷苦戰、贏得如雷掌聲的臺灣女跆拳道選手蘇麗文，卻和他們不同。比賽前，蘇麗文告訴臺灣《聯合報》的記者：「我是為父親而戰」；比賽結束，她接受北京中央電視臺訪問時，也表示：「在比賽的過程當中，沒有辜負大家對我的支持和鼓勵，尤其是我的家人，所以為了他們，我應該要更努力！」²

前述球迷和運動員不同的表達方式，正提醒我們，運動到底是為誰？就像朱木炎、張榮三說了：「對不起國家！」的第二天，

¹ 〈金落空，朱木炎：對不起國家〉，《聯合報》，2008 年 8 月 21 日，A5。

² 蘇麗文在三場比賽中，負傷倒地 11 次，仍忍痛應戰，最後她雖然沒有獲得任何獎牌，但現場與電視機前的觀眾，都被她的勇氣感動落淚。〈為癌父忍膝傷，奮戰不退〉，《聯合報》，2008 年 8 月 22 日，A1；另外，是來自 8 月 23 日，北京中央電視臺的訪問。

臺灣一位著名的媒體人陳鳳馨，忍不住在她的廣播節目裏問道：「他們爲甚麼要向國家道歉？國家爲他們做了甚麼？」不可否認的，這些運動員是以國家代表隊的身分參賽，他們理所當然的把比賽成敗，和國家榮譽劃上等號，但除了國家之外，是否還有其他目的？爲甚麼不能像蘇麗文一樣，不把「國家」高掛嘴上？

當我們把歷史推回到一百多年前，便會找到原因，因爲近代西方體育傳入中國之後，體育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早就如此的盤根錯節。進一步觀察，更不難發現，清中葉以降到 1937 年，中國迭遭外力入侵，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紛紛提出各種挽救國家的呼籲，這期間，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，和人民的生活環環相扣，也因此，有關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的研究，廣受中外學者關注，論著也多得不可勝數。³近年來，更有不少學者以建構、想像或神話這些觀念，去檢視國族概念產生的原因，或是探究國家與國民關係的建立；⁴有的學者，特別是研究性別史的學者，把

³ 羅志田，《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8），頁 60-108、169-177；羅志田，《亂世潛流：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 93-192；翟志成，《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（1895-1945）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7），頁 15-56。

⁴ 其中沈松僑對這方面的研究最爲豐富，論著有〈我以我血薦軒轅——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〉，《臺灣社會研究》，期 28（1997 年 12 月），頁 1-77；〈振大漢之天聲——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 33（2000 年 6 月），頁 77-158；〈國權與民權：晚清的「國民」論述，1895-1911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 73 本第 4 分（2002 年 12 月），頁 685-734；〈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——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〉，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》，期 3（2002 年 12 月），頁 49-119；〈召喚沉默的亡者：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族歷史？〉，《臺灣社會研究》，期 57（2005 年 3 月），頁 241-246；〈江山如

焦點放在國家和女性上，尤其注意當時代流行的「女國民」、「國民之母」這些話語。⁵顯示半世紀的中國，無論男女都得承載拯救中國的重任。

由於體育在當時被認為是「強國強種」的利器，也是去除「東亞病夫」⁶污名的良藥，研究近代中國體育史或身體史的不少學者，掌握了這些言論，不是著眼於體育和民族主義的宣導，便強調近代中國人的身體是受國家操弄。⁷而從性別角度從事體育史研

此多嬌——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》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，期37（2006年6月），頁145-216。另外，村田雄二郎，〈近代中國「國民」的誕生〉，收入林振江等主編，《全球化與中國、日本》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80-98；坂元ひろ子，《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——人種・身体・ジェンダー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2004）。

⁵ Joan Judge, *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: The Past, the West,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8), pp. 107-138；鄭永福、呂美頤，〈關於近代中國「女國民」觀念的歷史考察〉，《山西師大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，卷32期4（2005年7月），頁58-63；須藤瑞代，〈中国「女權」概念の変容：清末民初の人権とジェンダー〉（東京：研文出版，2007），頁74-83。

⁶ 從「東亞病夫」這個名詞在中國歷史上的演進過程，楊瑞松發現，其中充斥著太多認知上的謬誤和不必要的情緒操弄。楊瑞松，〈想像民族恥辱：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「東亞病夫」〉，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》，期23（2005年5月），頁1-44。

⁷ 許義雄，〈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體育思想之特質〉、戴偉謙，〈民族精神教育之體育思想〉，以上二文收入許義雄等著，《中國近代體育思想》（臺北：啓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6），頁1-36、575-614；Andrew D. Morris, *Marrow of the Nation: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4), pp. 77-140；黃金麟，〈歷史、身體、國家：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(1895-1937)〉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1），頁58-80、97-107；黃金麟，〈政體與身體：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，

究的我，在撰寫〈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〉時，也發現鼓吹女子體育的言論深受國族主義影響，但撰寫這篇論文的時候，我也看到女子體育的言論，並不完全偏重國族論述，來自西方的「健美」(Healthy and Beauty)觀，超越了泛政治化的語言，把女子運動帶入女性的生活世界；到撰寫〈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(1920-1940年代)〉時，我更加確定「國家」不是宣導運動的唯一目的。

在性別史這個領域，其實有不少學者和我一樣，挑戰泛國族主義，從晚清到抗日戰爭，都有學者提出類似研究，高彥頤(Dorothy Ko)、楊念群的纏足、⁸季家珍(Joan Judge)的留日女學生、⁹彭小妍的女性情欲論述、¹⁰劉乃慈的女性小說、¹¹羅久蓉的

1928-1937》(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5)，頁266-278。

- ⁸ 清末民初，反纏足的論述和國族主義結合成一股力量時，許多人認為，女性纏足是國家的恥辱，有的男性甚至假借女性，認同這些看法，但高彥頤對這樣的指控，很不以為然，她強調應該從女性的自我看待，去瞭解小腳的問題。參見高彥頤(Dorothy Ko)著，苗延威譯，《纏足：「金蓮崇拜」盛極而衰的演變》(*Cinderella's Sister: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*) (臺北：左岸文化出版社，2007)。楊念群也同樣注重被纏足者的聲音，楊念群，〈從科學話語到國家控制：對女子纏足由「美」變「醜」歷史進程的多元分析〉，收入汪民安主編，《身體的文化政治學》(開封：河南大學出版社，2004)，頁1-50。
- ⁹ 季家珍從中國留日女學生的活動以及回國後的生活，對國族論述提出懷疑，Joan Judge, "Beyond Nationalism: Gedner and the Chinese Student Experience in Jap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," 收入羅久蓉、呂妙芬主編，《無聲之聲(III)：近代中國的婦女與文化(1600-1950)》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3)，頁359-393。
- ¹⁰ 對清末到五四時期營造出一種建構民族國家的「文化想像」，彭小妍提出有不同的見解，她認為儘管女權論述是其中一環，並不表示晚清以來的婦女問題就此淪為政治策略，失去本身訴求的自發性。她反而在五四時期女性情欲

女間諜¹²都分別透過不同角度，處理性別和國家之間的複雜關係，並尋找女性的聲音或女性的自主意識。嚴格來說，我們的研究並沒有否定國族論述的存在，近代中國面臨各種內憂外患，是一個既定事實，而捍衛國家民族的意識也的確深入人心，但通過多元文本、不同論述或女性自述，「國家」這個概念不是處處主導著女性，每一個人的生命和生活，還有國家以外的考慮，何況口號雖然可以不斷吶喊或複製，但和實踐往往是兩回事，就同新文化運動時期，許多男性知識分子把解放女性喊得喧天價響，到頭來他們還是敵不過男權意識。¹³因此，我們強調從不同主體去詮釋歷史，能讓單一或少數主體的意識形態或說法，有較多的參照面。而本書的思維架構便是繼續從性別視角以及多元、複雜的

論述衍生的「新性道德」中，找到「女性中心說」的「文化想像」，析理出女子的情欲自主、主導，如何轉為「國事」主導。參見彭小妍，〈五四的「新性道德」——女性情欲論述與建構民族國家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3（1995年8月），頁77-96。

¹¹ 從五四時期到1930、1940年代的女性小說中，不斷出現性別與國家民族話語的交鋒，即便是在國家民族為主軸的中日戰爭時期；劉乃慈特別舉出，1940年代左翼女作家的自傳體小說中，顯現在民族革命奮鬥過程裏，從未放棄性別差異，她們不願抹煞女性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性別特徵，並且不曾放鬆她們對婦女解放的急迫關心。參見劉乃慈，〈第二／現代性：五四女性小說研究〉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4），頁253-263。

¹² 羅久蓉指出，把歷史人物納入不同的敘事中時，凸顯性別因素在國族論述中的重要。參見〈歷史敘事與文學再現：從一個女間諜之死看近代中國的性別與國族論述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11（2003年12月），頁47-98。

¹³ 游鑑明，〈是補充歷史抑或改寫歷史？近廿五年來臺灣地區的近代中國與臺灣婦女史研究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13（2005年12月），頁76、78-83。

面向，探討近代中國的女子體育，跳脫被國家化的體育史和身體史研究。

事實上，除了較偏重國家和體育關係的討論之外，近代體育史的研究還包括其他方面，其中以通史為題材的論著最多，凡是體育政策、體育思想、學校體育、體育人物、運動競賽都納入討論，惟這類論著較少分析；¹⁴近年來，有學者從社會文化、區域史和運動會發展進行研究，並注重析論，特別是毛岸俊(Andrew D. Morris)的研究，令人耳目一新。¹⁵可惜的是，上述論著對女子體育不是隻字未提，便是著墨不多。

目前研究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史的學者，有 Susan Brownell、樊紅、董進霞、王惠姬、Denise Gimpel、Yunxiang Gao 和 Elizabeth

¹⁴ 吳文忠，《中國近百年體育史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7）；成都體育學院體育史研究室編，《中國近代體育史簡編》（北京：人民體育出版社，1981）；王振亞，《舊中國體育見聞》（北京：人民體育出版社，1987）；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、中國體育史學會編，《中國近代體育史》（北京：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，1989）；喬克勤、關文明，《中國體育思想史》（蘭州：甘肅民族出版社，1993）；蘇競存編，《中國近代學校體育史》（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4）；許義雄等著，《中國近代體育思想》；崔樂泉，《中國近代體育史話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）；徐元民，《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體育思想之傳播》（臺北：師大書苑有限公司，1999）。

¹⁵ 除 Andrew Morris 之外，還有徐元民、郎淨、羅時銘等人的論著，其中羅時銘的專書沒有附註，殊為可惜。徐元民，《中國近代運動競賽》（桃園：國立體育學院，1996）；Andrew D. Morris, *Marrow of the Nation: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4)；郎淨，《近代體育在上海：1840-1937》（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2006）；羅時銘，《奧運來到中國》（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2007）。

A. Littell-Lamb。Susan Brownell 從身體文化的角度，研究 1949 年之後中國的身體訓練，除了注意國家的體育訓練，也留意中國老百姓對自我身體的看法和鍛鍊；樊紅討論 1840 到 1949 年，中國女子體育發展的進程，指出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共產黨的體育政策，讓女性在運動中，得到自由；董進霞和 Susan Brownell 一樣，關注當代中國大陸的女子體育，但偏重 1957 年之後的體育發展；王惠姬探討 1900 到 1937 年間，中國女留學生攻讀體育的過程和回國後的貢獻；Denise Gimpel 是根據清末民初的刊物，觀察當時女性如何表達自己的女子體育觀，認為這些論點呈現了現代性和自由意涵；她的另一篇論文，則進一步透過近代女運動家的口述訪問等資料，說明女性如何藉由運動，掌握自己的身體，再去貢獻國家。Yunxiang Gao 以《玲瓏》這份刊物為例，分析在中國面臨日本侵略的 1930 年代，國家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如何論辯「健美」；Elizabeth A. Littell-Lamb 關注 1915-1925 年間，基督教女青年會設置女子體育師範學校的過程和目的。¹⁶至於我

¹⁶ Susan Brownell, *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: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's Republic* (Chicago and London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95); Fan Hong, *Footbinding, Feminism and Freedom: The Liberation of Women's Bodies in Modern China* (Portland: Frank Cass, 1997); Jinxia Dong, *Women, Sport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: 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Sky* (Portland: Frank Cass, 2003); 王惠姬，〈二十世紀前期女子留學生與中國體育的拓展(1900-1937)〉，收入《走向近代》編輯小組編，《走向近代：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》（臺北：東華書局，2004），頁 253-299；Denise Gimpel, "Freeing the Mind Through the Body: Women's Thoughts on Physical Education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," *Nan Nu* vol. 8 (September 2006); pp. 316-358; Denise Gimpel, "Exercising Women's Rights: Debates on

從 1996 年以來，分別從女子體育觀、華東地區的女子球賽、女子健美論述、媒體與女子體育以及女子運動圖像，分析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歷史。¹⁷

前述學者和我的研究，雖然採用了不同的視角，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關懷。例如，近代中國女性運動的目的何在？誰促使女性運動？女性的運動觀是甚麼？而且多少都涉及到女性和體育政策或輿論之間的關係。只不過，除此之外，社會大眾（包括觀眾和體育評論者）、傳媒（包括報刊、商業廣告和藝術文化）乃至學校和學生，是怎麼看女子體育或女子運動競賽？他／她們的聲音在哪裡？並沒有受到較多關注；在撰寫華東

Physical Culture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,” in Kai-wing Chow, ed., *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: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* (Lanham: Lexington Books/Rowman & Littlefield, 2008), pp. 95-130; Yunxiang Gao, “Nationalist and Feminist Discourses on Jianmei (Robust Beauty) during China’s ‘National Crisis’ in the 1930s,” *Gender & History* 18:3 (November 2006), pp. 546-573; Elizabeth A. Littell-Lamb, “Gospel of the Body, Temple of the Nation: The YWCA Movement and Women’s Physical Culture in China, 1915-1925,” 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 16（2008 年 12 月），頁 167-207。

¹⁷ 有四篇論文和一本專書：〈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〉，《新史學》，卷 7 期 4（1996 年 12 月），頁 119-158；〈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(1927-1937)：以報刊雜誌為主的討論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期 32（1999 年 12 月），頁 57-122；〈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（1920 年代—1940 年代）〉，收入游鑑明主編，《無聲之聲(II)：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（1600-1950）》，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3），頁 141-172；“Femal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Media in Modern China,” in Mechthild Leutner and Nicola Spakowski, eds., *Women in China: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* (Münster: LIT Verlag, 2005), pp. 482-506；《近代中國女子的運動圖像——1937 年前的歷史照片和漫畫》（臺北：博雅書屋有限公司，2008）。

地區的女子球賽時，我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，此後也朝這方向展開。進一步說，本書著眼於健美論述、性別關係、觀眾角色、學生反映以及傳媒力量，試圖提出過去學者忽略的觀察。

討論本書之前，先對中國女性的體育史做一鳥瞰。一般認為，傳統女性是不運動或很少運動，其實透過出土文物、史冊文獻、詩詞、小說或圖像資料，可以看到傳統女性盪鞦韆、放紙鳶和踢毽子，既娛樂自己，又鍛鍊了身體。¹⁸即使需要費體力的運動，像蹴鞠（中國式足球）、馬球和步打球（即持杖打球）、甚至相撲（即女鬪）、拔河，也都有女性的身影。¹⁹以蹴鞠為例，從兩漢到元明，女子蹴鞠的活動，一直不曾中斷，直到清代，才被踢毽子取代。²⁰至於會騎射、拳術或武術的女子，歷代也不罕見，她們多半是受父兄訓練，把這些活動當做為娛樂或健身；²¹也有

¹⁸ 劉秉果，《中國古代體育史話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 122-127、130-132。

¹⁹ 馬球是唐、宋宮廷中宮女的一種娛樂活動，這項活動到清代就完全絕跡；步打球又稱捶球，盛行於元、明時期，在明代的畫中，可看到女性作步打遊戲，但和蹴鞠、馬球一樣，步打球到清代就中斷。至於相撲表演，雖然三國時期的東吳，曾有宮女的相撲遊戲，宋代出現的女子相撲，卻相當講究技巧，相撲到清代還是受到重視；拔河比賽原本多是男子參加，唐中宗時，曾讓數百名宮女在玄武門外拔河比賽，不過，這種大規模的活動，在其他朝代很少看到。劉秉果，《中國古代體育史話》，頁 35-37、46-51、120-122；劉秉果，《插圖本中國體育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 128、134-135、217-220、224、271-272、282-285、320-332。

²⁰ 劉秉果，《中國古代體育史話》，頁 14-23；劉秉果，《插圖本中國體育史》，頁 92-116。

²¹ 在宋代蘇東坡的詩中，曾描寫刺史劉乙新邀請朋友觀賞他們兒女的騎射之戰。騎士，〈閒話婦女：女子體育與弓箭〉，《方舟》，期 36（1937 年 5 月），

女性，藉由這些技能來防敵或打仗。²²從前述看來，傳統女子不乏體能運動，但如果和近代體育比較，除了球戲有較多人參與之外，傳統運動多半屬於個人或少數幾個人；同時，傳統女性的運動，大多是為了消遣、娛樂或是健身，不像近代體育帶有濃厚的競賽動機。

無疑的，到了近代，中國女性的運動出現大的變化，一方面，近代的女子體育是被有目的的宣導、有計畫的運作，並透過學校教育，採循序漸進的集體訓練方式，對女性進行身體鍛鍊；另一方面，運動的型態出現很大程度的改變，運動的內容也比過去豐富許多，最早是體操運動、舞蹈，接著有溜冰、騎自行車、游泳，以及各式球類運動、田徑運動，體育因此邁入運動競賽的時代。近代體育還有一個特色，也就是運動的對象沒有性別限制，不管女子或男子，都被要求運動；不過，這種情形在運動會上，卻有了不同。男性在清末就可以參加運動競賽，而同時期的女性僅以表演方式，向大眾展示運動成果，直到 1920 年代末期，區域運動會、全國運動會或國際性運動會陸續開放競賽項

頁 71；另外，1900 年出生的冰心（原名謝婉瑩），也提到童年時期，她父親經常帶她去騎馬、打槍，讓她有機會接觸到與其他兒童不一樣的戶外活動。冰心，〈童年雜憶〉，收入范伯群編，《冰心研究資料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84），頁 63。

²² 例如，殷商時期的女將婦好、南朝嶺南的洗夫人、唐高祖的女兒平陽公主、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的夫人梁紅玉、明末抗清女將秦良玉，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女中豪傑。華吾豪，〈中國女子體育史略〉，「特載」，《中國女子體育專門學校二十周紀念冊》（1929），頁 48-61。上海檔案館藏，檔號：Q235-3-324。吳芳，《中華女英傑》（武昌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 2-6、42-45、118-121、143-147。

目給女性，女性運動才出現重大突破。但無論如何，從此以後，女性除了能進入原屬於男性的表演空間之外，還能在運動場所，與男性一較短長；最重要的是，在社會大眾的眼中，只要能在運動競賽中取勝，男女運動選手的位置，都同樣重要。換句話說，近代女子體育讓中國女性能發揮身體的潛能，也帶給她們機會，去改變女性的歷史。

由於前述具有近代意義的女子體育，是來自歐美，在追溯西方的體育訓練方法時，會發現美國的體育，也是先學習德國體操和瑞典體操，再走向其他活潑的競賽。²³在運動場上的演出，西方也充滿性別區隔和性別偏見，以近代的奧林匹克運動會(Olympic Games)為例，奧運會一開始是禁止女性參賽，1900 年的第二屆奧運會，才有來自 5 個國家的 19 名女運動員，參加了女子網球賽和女子高爾夫球賽。²⁴這以後，女性雖然不被禁止參加奧運，比賽項目卻與男子不同，一直到 1924 年，奧委會正式通過女子可以參加較多的競賽項目，1928 年，女子田徑賽也有了登場的機會；然而，仍有少數男子組的比賽項目，例如棒球、拳擊、角力等項目，到現在還是與女性無緣。²⁵除此之外，隨著西方體育帶

²³ 張詠，〈社會情形與體育之發展〉，《現代學生》，卷 3 期 1（1933 年 10 月），頁 2-5。

²⁴ 在第二屆奧運上，英國和美國的選手分別獲得網球和高爾夫球金牌。參見湯銘新編譯，《奧運百週年發展史》（臺北：中華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，1996），頁 53、61；董進霞主編，《女性與體育：歷史的透視》（北京：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 31。

²⁵ 湯銘新編譯，《奧運百週年發展史》，頁 162；徐元民，《體育史》（臺北：品度股份有限公司，2005），頁 237。

來的體育精神、錦標主義、消費行爲，還有「健康美」觀念，也對近代中國的社會價值和兩性關係的改變，起了不小影響。

針對中國女性在近代體育史上的大轉變，本書提出五個問題：爲何要女性運動？女性應該怎麼運動？女學生和女運動選手如何看待運動？媒體和社會大眾又以何種眼光看待女子體育和女運動員？女子的運動競賽是否符合宣導女子體育的初衷？至於時間斷限，集中在 1895 到 1937 年中日戰爭之前，之所以選擇這段時期，是因為在此時中國女性的身體運動有很大的變化，也培養出不少具備運動長才的女運動員；沒有延伸到第二次中日戰爭，是因為戰爭讓運動選手星散四處，許多運動競賽無法正常舉行，鬧熱滾滾的全國性運動會更不復存在。

必須一提的，我過去發表的相關論著，和上述五個問題有緊密關係，因此，本書有一部分改寫或取材自這四篇論文和一本專書。例如，第一章第二節和第三節的討論，是根據〈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〉和〈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（1920-1940 年代）〉這兩篇論文加以延伸；第三章的第二節，有部分取材自〈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(1927-1937)：以報刊雜誌爲主的討論〉和《近代中國女子的運動圖像：1937 年前的歷史照片和漫畫》；第六章的第五節，小部份引自〈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：以報刊雜誌爲主的討論〉。至於其他章節則是重新撰寫。

本書書名爲《運動場內外：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(1895-1937)》，採用「運動場內外」有兩層意思：最直接的意思是，本書將探究女運動員在運動場上的演出，觀察她們離場後的活動，也留意運動場邊的眾生相；另一層意思，則是透過「運動場」這個概念，分析沒有進入運動場、不懂也不做運動和沒有進入運動

場、卻懂得運動的這兩群人，如何鼓吹、利用、指導或評論運動，這群人包括知識分子、體育專家、女權運動家、學生、記者、畫家、廣告設計者、影評家、導演、編曲者。

至於本書所謂的「華東地區」，是指江蘇、浙江兩省和上海、南京兩市，選擇華東地區，除了以〈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(1927-1937)：以報刊雜誌爲主的討論〉一文爲基礎，擴大研究之外，一方面，近代女學校多半集中在華東地區，女子體育又出自學校，這個地區學校的女子體育，正可做爲瞭解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指標；²⁶同時，專門訓練女子體育人才的學校，自清末到1937年，約計有15所，其中有11個學校和科系設在華東地區。²⁷另

²⁶ 俞慶棠曾以1927和1928這兩個年度爲例，指出全國女子中學生的人數不多，但比起江蘇省更加爲少；再根據《中國第一次教育年鑑》的統計，1930年度全國中等學校的女校計104所，其中江浙合計12所，上海20所、南京2所，華東地區就占了32.69%，若以女學生的人數爲例，這個年度，江浙女學生合計14,800人，南京1,345人、上海9,146人，華東地區占27.98%，光是上海的女學生人數就位居全國第三；至於全國專科以上學校，以私立學校最多，而且多分布在上海和北平，由此可見，華東地區是全國女學生最密集的地區。俞慶棠，〈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女子教育〉，收入莊俞等編，《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1），頁191-192；《中國第一次教育年鑑》，收入教育部中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，《中國教育年鑑》（臺北：宗青圖書出版公司據第一次與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原刊本影印，1981），頁2、105、138-139。

²⁷ 這15所學校是中國女子體操學校、上海女子青年會體育師範學校、上海愛國女中體育科、廣東女子體育學校、南京女子體育師範學校、上海東南女子體育專門學校、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專門學校、上海東亞體育專門學校、上海中國女子體育學校、北京女子文理學院體育專修班、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體育系、上海滬江女子體育學校、金陵女子大學體育系、蘇州成烈體育專門學校、四川女子體育學校。以上參見吳文忠，《中國近百年體育史》，